

略论巴文化与天府文化的关系

黄剑华

内容提要：巴文化与天府文化，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两者都既有丰富的历史地域内涵，又有浓郁的人文特点，并与周边区域有着广泛而又活跃的交流。天府文化与巴文化刚柔相济，文武兼备，兼容并蓄，在巴蜀地区的发展进程中谱写了绚丽多彩的篇章，迄今仍洋溢着充沛的活力，焕发出独特的光彩与魅力。

关键词：巴文化；古蜀文明；天府文化；地域特色；巴蜀人文

一、巴文化的历史地域特色

巴文化是一种历史地域文化，其历史传承应该始于先秦时期，在秦汉之后有了新的沿袭和发展。其地域范围主要是以四川盆地的北部和东部为主，也囊括周边的一些地区。巴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域内涵，又有鲜明的人文特色，历史文献对此就有较多的记载，考古发现对此也给予了很好的揭示。

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文献记载透露大大小小的部落至少有百数个，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司马迁《史记》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西其北又以什数。汉代班固在《汉书》中也对此也有相同记载。^①《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②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其中的蜀当然是势力最强的，《战国策·秦一》就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③巴与蜀相

① 参见（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册第2991页，1959年版。参见（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1册第3837页，1962年版。

② 参见《尚书正义·周书·牧誓》，（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83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参见王世舜《尚书译注》第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又参见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第21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参见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第91页，巴蜀书社，1998年版。

邻,也是相当强大的部族。《华阳国志》说,巴也和蜀一起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巴、蜀的崛起与兴盛,主要是通过部族与氏族之间的相互联姻,或者结成联盟,从而成为西南地区两个强大的宗主国。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述:“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①

蜀国与巴国都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联盟,但源起并不相同,部族关系也各有特点。蜀国的历史,见诸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譬如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②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古蜀早期历史也有简略的记述,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③古史中关于蜀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给人以太多的传说与推测之感,但也并非虚构,后来的考古发现便给予了充分的印证。譬如众所周知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宝墩古城遗址群等重大考古发现,就揭示了古蜀文明的悠久与灿烂辉煌。关于巴国的源起,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多,同样也有较浓的传说色彩。譬如《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巴人乃太皞之后,“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则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⑤而根据《后汉书》卷八六记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谭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后来共立巴氏子务相为君,是为廪君。^⑥在《世本》《水经·夷水注》中,也有类似记述^⑦。廪君崛起的时代,文献记载没有细说,但有一点则是清楚的,廪君蛮可能是巴人的主体族群之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氏族与部落,共同组成了巴国。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賸、苴、共、奴、獯、夷、蜚之蛮”。由此可知,除了廪君蛮,还有濮人与賸人等,都是巴国的重要部族。秦汉时期嘉陵江流域有善于射虎的板楯蛮,板楯蛮有罗、朴、咎、鄂、度、夕、龚七姓,^⑧也是巴国的重要族群之一。传说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所以巴人有崇奉白虎的习俗。又因为巴国是由多个族群构成的国家,所以既有崇拜白虎的氏族,也有畏惧白虎和射杀白虎的部族。如果从西南地区部族众多的情形来看,巴人的发祥之地可能有多处,经过长时期的联盟与联姻,才逐渐形成了巴国。到了文献记载中的廪君时代,巴国的历史终于明朗起来,开始建立政权,并有了早期的都城。《华阳国志》卷一、《水经注》卷三十三都说“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那已是战国时期了。

① 参见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30页、第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又见《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199~200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② 参见(汉)扬雄著《蜀王本纪》,《全汉文》卷五十三,(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414页,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版。

③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175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又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第89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第514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⑤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101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⑥ 参见(南朝宋)范曄撰《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册第2840页,1965年5月第一版。

⑦ 参见(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世本》记述,第4册,第3410页,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参见(北魏)郦道元撰、王国维校《水经注校》11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8页,第37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见(南朝宋)范曄撰《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册,第2842页,1965年版。

秦并巴蜀之后，打破了巴蜀之间的疆域隔阂，将蜀国和巴国都纳入了秦朝统一的版图。秦朝对蜀地着重采取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用的统治方式，相继分封了三位蜀侯（王子通国、公子恢、公子綰），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了成都城、郫城与临邛城，并从秦国本土往蜀地大量移民，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就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状况。秦灭六国之后，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这些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了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带来了致富后的奢侈之风。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正是由于“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①所以对后世的民俗民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朝对巴人主要采取了联姻与怀柔的策略，来加强对巴地的控制。《后汉书》说“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②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进一步将巴蜀纳入了统一格局下的行政管理，将秦初置的巴、蜀、汉中三郡三十一县不断添置达四十一县。秦朝一方面十分强势地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巴蜀文化习俗的宽容。秦朝采取的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将北方和中原的很多东西输入了统一后的巴蜀地区，也促使并加快了巴蜀区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巴蜀区域文化由此吸纳和融入了许多新的文化，经过历代传承，形成了许多鲜明的特点。

巴人的习俗与民风，由于族群与地域环境的原因，自古以来形成了一些较为显著的特色。传世文献对巴人的人文特点，就有许多如实的记述。一是质朴敦厚，忠诚好义，多出将帅之才。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又说“巴师勇锐”，“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就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巴人的这一重要特点。在巴国历史上有巴蔓子将军，赤忱爱国，忠勇刚烈，舍生取义。据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乃自刎，以头授楚使”。巴蔓子是巴国的忠勇之臣，当然不会将巴国的领土拱手送给楚王，于是自刎以谢楚使，被称为是巴国历史上典型的千古忠烈人物。“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醇俗厚，世挺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③二是奋勇争先，有勇武之风。三是粗犷豪迈，有乐观精神。据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蜀曾一起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这种尚勇之风在汉代仍有突出表现。“阆中有渝水，賈民所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

①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194页，第225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② 参见（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册，第2841页，1965年版。

③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8页、第83页、第32页、第101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关于巴蔓子的故事，又参见《宋本方輿胜览》卷六一、《大明一统志》卷六九、《蜀中名胜志》卷十九等记述。

令乐人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后汉书》卷八十六对此也有相同记述。^① 四是天性豁达，不畏险阻，随遇而安，有坚韧随意的性情和吃苦耐劳的民风。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巴之涪陵等地，“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戇勇”，便反映了巴人的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巴地沿江的纤夫，水陆码头的背夫，都以吃苦耐劳而闻名。为了便于同周边往来与贸易，在巴地周围的崇山峻岭之间修筑道路、开通栈道也多是巴人所为，以上都生动地展现了这种民风与性格的特点。正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秦陇与巴蜀之间很早就有商贸往来，虽然险阻甚多，交通不便，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② 便是很好的例证。五是特别喜欢音乐歌舞，增添生活中的乐趣，古代著名的“下里巴人”与“巴渝舞”就曾广为流传，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选》刊载的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③ “下里巴人”是古代巴、蜀地区的通俗歌曲，在楚地得到了人们的喜欢，可见其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还有“巴渝舞”，在汉代不仅为宫廷所重视，同时在民间也很盛行，川东地区发现的汉代画像上就描绘和刻画了巴人动作劲勇、刚健有力的舞蹈情景^④。值得注意的是，在巴人生活的区域内，从古至今与生产劳动、手工制作、节庆活动等相关的民俗也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很多民俗已成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洋溢着独特的神韵，迄今仍充满活力，令人赞叹。

概而言之，巴文化的元素，是巴人血脉里的遗传，不仅在巴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中有生动的展示，也体现在巴人的性情与言谈举止之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巴文化蕴藏了巴人生活区域内的重要文化基因，由于地域与族群的原因，自古就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民俗民风，代代相传，耳濡目染，历久弥新。

二、天府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

巴与蜀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两大部族联盟，由于地域相近，在文化习俗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古人常将巴蜀连称，可见二者关系非同一般。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述，中国按地理可分为九圉，“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圉，圉中之国则巴蜀矣”，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岛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⑤ 这些记载说明，巴蜀在先秦时期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在地理上属于同一区域，在与华夏交往等重大事务中通常属于同一战线的同盟国关系，所以常常一起参加很多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

我们常说巴山蜀水，巴蜀自古以来在自然环境方面就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巴人的生存

①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1页，第37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参见（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册第2842页，1965年版。

② 参见（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册第3261~3262页，1959年版。

③ 参见（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册第628页，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版。

④ 参见《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第7册《四川汉画像石》，图三七，图一六四，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0~21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

环境大都是山地与丘陵，而蜀人主要生活在肥沃的成都平原与周围的浅丘坝子，由此形成了生活习俗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的特点。巴蜀地区有着不同的民风与人文特色，这与自然环境的滋养，以及文化基因的遗传，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譬如巴人的彪悍与蜀人的温和，巴人的尚武与蜀人的好文，巴人讲究辛勤节俭与蜀人喜欢悠闲享乐，巴人的性格比较外向而阳刚，蜀人的性情比较适意而阴柔，就是比较明显的差别。两者虽然有不同，却又互相渗透，相互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秦并巴蜀之后，将巴蜀纳入了统一格局下的行政管理，加速了华夏文明与巴蜀区域文化的融合，也进一步密切了巴文化与天府文化的关系。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关于天府文化的概念，应该是包含了历史继承、地理环境、行政区域等内容与要素的。从性质上讲，天府文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其地域范围主要是以成都平原为主，并向四周延伸，包括四川盆地，经过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如果寻本溯源，其源头应该是古蜀文明。也可以说，古蜀文明既是天府文化的根脉所在，又与天府文化有着源流关系。我们过去讲巴蜀文化，主要说的是先秦时期的地域文化，而天府文化主要是秦汉以来在全国大一统行政格局下形成的地域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人文内涵方面，融汇古今，具有更为具体而深厚的内容，既有历史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更有当今地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以前所谓巴蜀文化，其自然地域范围比较宽泛而笼统，是包括了巴、蜀两地，将成都和重庆等地都囊括在内的。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在行政上与四川分而治之，于是提出了巴渝文化的概念，对重庆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做了比较具体的界定和新的诠释。现在成都和四川提出天府文化的概念，以此作为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地域文化命名，与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域的划分相一致，也是很有道理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以前说巴蜀文化，充分显示了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现在说天府文化，更具有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特色。在传统地域文化特色方面，天府文化的概念更为具体也更加准确，在文化内涵上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也更能彰显成都平原与四川地域文化的魅力。

天府文化既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又有很强的包容性。天府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 悠久的历史传承是天府文化的基础，其中包括古蜀时期的缘起、秦并巴蜀之后的作为、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积极意义、诸葛亮治蜀的影响以及后来的社会变化与商贸发展。2. 治水精神是天府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从大禹治理岷江水患，到李冰建造都江堰，由此水旱从人，时无荒年，成都平原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3. 人文的绚丽与厚重是天府文化的主要内涵，包括神话传说、精神崇尚、信仰观念、文化习惯、民俗传统等，自古以来就富有特色。又譬如昆仑仙话的起源，道教的发源地，都与岷山之域有着密切关系。此外从衣食住行到生活习俗，从传统观念到思想文化领域，都有很多精妙而又独到的特点。4. 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是天府文化的重要动力，汉代文翁在蜀郡大力兴办学校，人才大量涌现，《汉书·地理志》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①由此而开创了一代新风，使蜀地成了一个文化勃兴和文运昌盛的地区。五、成都是天府文化最重要的汇聚之

① 参见（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校点本，第6册，第1645页，1962年版。

处,成都的昌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奥秘,就是得益于天府文化的滋养,使之历久弥新,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城市个性特色。譬如成都的休闲特色,城市的舒适感觉,汇聚与包容的城市风气,知快守慢的生活节奏,兼容并蓄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就充分展现了天府文化的浓郁魅力。成都也因之成为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或者走了之后还想再来的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大都会。天府文化的特色和吸引力,在成都可谓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彰显。

天府文化与巴文化虽然各有特色,相互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密切。在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中,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舟船往来,秦陇与巴蜀之间的栈道通商,还有南丝路上的远程贸易,都是古代巴、蜀共享和互利的行为方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历来是互利合作的,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古蜀时代杜宇教民务农,当时的巴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由此使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与经济文化都变得繁荣,这就是关系密切的一个最好例证。除了悠久的历史传承,天府文化与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也是相互渗透、互相交融的。历史上有“三巴”之说,反映了巴文化分布的区域实际上是比较宽广的。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述,东汉末益州牧刘璋将古巴国之地分置为巴东、巴郡、巴西,各任太守,是为“三巴”,^①就说明巴人生活的区域由东至西空间跨度很宽,巴文化也并不局限在一个行政管理范围之内。后来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巴蜀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也常有变化,而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民俗民风则依然如故,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习俗也一直保留。到了现代,虽然重庆成了直辖市,但历史上很多传统的巴人区域仍在四川的范围之内,像巴中、达州等地都有浓郁的巴文化特色。嘉陵江流域与渠江流域在古代都是巴人的主要活动与栖居之地,其中也大都属于四川管辖的范围。正是这种历史的沿袭与地域环境相近的原因,天府文化与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巴文化与当今倡导的天府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巴文化与天府文化都是经历了漫长岁月发展的历史地域文化,同时也是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传统地域文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巴文化与天府文化既有悠久的传承发展,又有不断的演化创新。我们对传统的巴文化与天府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有益于我们了解其源流与根脉,也有利于发挥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积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弘扬天府文化与巴文化的作用和意义

如何准确认识和评价天府文化与巴文化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如何更好地倡导与弘扬巴文化与天府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值得思索和掂量的问题。我认为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略作概括和评述。

首先是天府文化与巴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是中国富饶的内陆地区,在商周时期这里已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而且很早就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的曙光,开始了内陆农业与城市文明相结合的漫长而兴旺的发展历程。古蜀

^①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182页,第55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

文明的辉煌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遥相呼应，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史上共同谱写了重要的篇章。从秦汉以来，天府文化与巴文化已成为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既是中国的大后方，也是中国的后花园，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曾不止一次展现出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天府文化与巴文化也不止一次滋润了历史的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天府文化与巴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大国，有着悠久而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传统地域文化中，天府文化与巴文化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鲜明的个性与深厚的内涵，或是巨大的凝聚力和立足西南面向世界的辐射作用，都生机勃勃光彩耀眼，正在继续谱写着绚丽多彩的篇章。关于四川和重庆的建设发展，从古至今都离不开天府文化与巴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在当代尤其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优秀的传统文化始终是城市与乡镇的灵魂，对于城市与乡镇来说，表面繁华并有深厚而绚丽的文化内涵就会充满魅力，如果只有浮夸而没有文化内涵那就是肤浅而空心的城市或乡镇。我们现在强调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而最能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通常都是和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交融在一起的，在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认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天府文化与巴文化的积极作用，其重要意义至少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加强文化自信，会促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基因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这不仅涉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也关系到树立正确的建设发展理念，有利于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充分彰显良好的地方文化品质。2.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人才的涌现与才智的汇聚，有利于增强建设发展的软实力，从而在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之中充满活力，为城市与乡镇的建设发展带来新气象。3.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扩大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资源共享、互利合作，也有利于拓展区域合作平台，提升综合发展的质量与水平。总之，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会使城市与乡镇充满正气，更加精神焕发，人才济济，更加兴旺，这应该是城市与乡镇繁荣发展的正道，是值得认真而积极倡导的好思路。所以重振和弘扬天府文化与巴文化，对当代成都和四川的建设发展，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者是如何弘扬天府文化与巴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如何使天府文化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也是非常值得思考和讨论的一个话题。我相信，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几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重视教育，充分发挥成都与四川自汉代以来重视教育的引领优势，这是天府文化与巴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弘扬天府文化与巴文化最为关键的环节。二是重视人才，既要广招贤能之士，又要重视人才培养。只有人才济济，才会使各项事业都占据优势，带来更加兴旺繁荣的发展。三是重视文化创新，包括文学艺术领域要鼓励多出精品佳作，使成都与四川再次成为文运勃兴之地。四是城市与乡镇建设要更加重视人文特色与环境保护，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宜居环境，积极倡导更加健康绿色的良好生活方式，同时也要特别倡导和谐、友善、诚信、奉献的价值观，大力倡导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精神，进一步彰显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五是在旅游业的规划与发展中，也要充分发挥文化优势的积极作用。文化不仅是城市的灵魂，也是旅游之魂，有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才能充分彰显当地的个性与魅力。一个地方

的旅游资源要吸引人，除了独特的山水与自然风光，关键还是文化的魅力。六是重视天府文化与巴文化的协同合作，以及同其他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形成良好的相互促进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及时改进自己的不足，这是亘古不变的人类社会兴旺之道。只有开放与交流的文化，才会海纳百川，永远充满活力，始终朝气蓬勃，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总而言之，巴文化与天府文化，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两者既有丰富的历史地域内涵，又有浓郁的人文特点，并与周边区域有着广泛而又活跃的交流。天府文化与巴文化刚柔相济，文武兼备，兼容并蓄，自古以来在巴蜀地区的发展历程中谱写了绚丽多彩的篇章，迄今仍洋溢着充沛的活力，焕发出独特的光彩与魅力。在成都和四川未来的发展中，天府文化与巴文化仍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